

THE REPRESENTATIVE WORKS OF THE CONTEMPORARY CHINESE SCHOLARS

当代中国学者代表作文库

A STUDY ON THE CULTURE AND TEXTS OF PRIMITIVE HISTORIANS (REVISED EDITION)

# 原史文化及文献研究

(修订本)

过常宝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THE REPRESENTATIVE WORKS OF THE CONTEMPORARY CHINESE SCHOLARS

当代中国学者代表作文库

A STUDY ON THE CULTURE AND TEXTS OF PRIMITIVE HISTORIANS (REVISED EDITION)

# 原史文化及文献研究

(修订本)

过常宝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原史文化及文献研究 / 过常宝著. —修订本.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6. 4

(当代中国学者代表作文库)

ISBN 978 - 7 - 5161 - 8389 - 2

I. ①原… II. ①过… III. ①官制—研究—中国—古代②中国—古代史—史籍—研究 IV. ①D691.42②K20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34453 号

---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史慕鸿  
责任校对 韩海超  
责任印制 戴 宽

---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

印刷装订 三河市君旺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6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30.25  
插 页 2  
字 数 483 千字  
定 价 109.00 元

---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当代中国学者代表作文库》

## 编委会

主任：李 扬

副主任：孟昭宇 赵剑英

委员：（按笔画排序）

|     |     |     |     |
|-----|-----|-----|-----|
| 丁伟志 | 于 沛 | 王 浩 | 冯天瑜 |
| 刘跃进 | 汝 信 | 李 林 | 李 扬 |
| 李景源 | 张卓元 | 张海鹏 | 杨 义 |
| 陈 来 | 陈众议 | 陈先达 | 陈祖武 |
| 孟昭宇 | 卓新平 | 周 泓 | 赵剑英 |
| 郝时远 | 袁行霈 | 黄 平 |     |

总策划：赵剑英

# 《当代中国学者代表作文库》

## 出版说明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开启了当代中国历史发展的新进程。伴随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发展的历史，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开辟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以及中西文化的碰撞交汇，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事业得到了显著的发展，涌现了一大批优秀的人文哲学社会科学学者及著作。这些著作体现了时代特色、民族特色和实践特色的统一，在其相应学科中具有开创性、奠基性和代表性。正是这些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作品，铸就了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辉煌成就，形成了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和方法的创新体系。

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直属的专门致力于推出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成果的学术出版社，我社 30 多年来，一直秉持传播学术经典的出版理念，把追求高质量、高品位的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著作作为自己的主要出版任务。为展示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巨大成就，积极推动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优秀人才和优秀成果走向世界，提高中华文化的软实力，扩大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国际话语权，增强在全球化、信息化背景下中国和平崛起所

必需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我社决定编辑出版《当代中国学者代表作文库》。

《当代中国学者代表作文库》收录新中国建立以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的优秀代表作，即在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中具有开创性、奠基性和代表性意义的著作。入选这一文库的著作应当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精品和珍品。因此，这一文库也应当代表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最高学术水平。

编辑出版《当代中国学者代表作文库》是一项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国家学术文化工程，对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动中国当代学术的创新发展，加强中外学术文化交流，让世界从更深层次了解中国文化，扩大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必将产生十分重要和深远的影响。我们愿与学者一道，合心戮力，共襄这一学术盛举。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0年8月

# 目 录

|                        |       |
|------------------------|-------|
| 绪言 .....               | (1)   |
| 第一章 史职及其文献的产生 .....    | (8)   |
| 一 “绝地天通”与史职的产生 .....   | (8)   |
| 二 商史的地位与职责 .....       | (16)  |
| 三 卜辞和“商书” .....        | (21)  |
| 四 铸鼎象物和图画文献 .....      | (32)  |
| 第二章 周公革命与礼乐教化 .....    | (42)  |
| 一 史职在西周的发展 .....       | (42)  |
| 二 周公摄政与政教分离 .....      | (58)  |
| 三 歌谣文献及其应用 .....       | (70)  |
| 第三章 “春秋笔法”中的话语权力 ..... | (88)  |
| 一 春秋史官文化的转型 .....      | (88)  |
| 二 “春秋笔法”及其叙事策略 .....   | (99)  |
| 三 《老子》和史官的箴诫传统 .....   | (116) |
| 第四章 《左传》研究 .....       | (129) |
| 一 史官“传闻”制度与《左传》 .....  | (129) |
| 二 《左传》的叙事逻辑 .....      | (139) |
| 三 《左传》梦验载录的文化意蕴 .....  | (151) |

|                               |              |
|-------------------------------|--------------|
| 四 《左传》虚饰中的理性意识 .....          | (165)        |
| <b>第五章 君子文化和原史传统 .....</b>    | <b>(180)</b> |
| 一 巫史知识的社会化 .....              | (181)        |
| 二 “君子”与立言传统 .....             | (199)        |
| 三 “诸子”与史官渊源 .....             | (225)        |
| 四 《论语》及其他诸子文献 .....           | (243)        |
| <b>第六章 《战国策》研究 .....</b>      | <b>(255)</b> |
| 一 史职的衰落与师道的兴起 .....           | (255)        |
| 二 《战国策》的文体特征 .....            | (262)        |
| 三 《战国策》的叙事特征 .....            | (272)        |
| <b>第七章 《春秋》与汉代文化 .....</b>    | <b>(292)</b> |
| 一 儒家与原史文化的复兴 .....            | (293)        |
| 二 原史经典的政治化途径 .....            | (305)        |
| 三 《春秋》与大一统政治形态 .....          | (321)        |
| <b>第八章 《史记》与原史传统的终结 .....</b> | <b>(348)</b> |
| 一 司马迁的史职观念 .....              | (349)        |
| 二 司马迁的个性精神 .....              | (365)        |
| 三 司马迁的文化复仇 .....              | (378)        |
| 四 《史记》的体例和书法 .....            | (404)        |
| 五 《史记》的悲剧精神 .....             | (428)        |
| <b>结束语:原史精神和道统观念 .....</b>    | <b>(443)</b> |
| <b>主要参考书目 .....</b>           | <b>(463)</b> |
| <b>后记 .....</b>               | <b>(475)</b> |



# 绪 言

本书所谓“原史”，与历史学界通常的用法不同<sup>①</sup>，指的是司马迁（包括司马迁）以前的历代史官。他们之所以明显区别于后世史官，不仅仅表现在时代先后上，还表现为身份特征、文献方式和文化功能等方面的差异。中国古代史官起源很早，我们可以从甲骨卜辞中追寻到史官产生的最初的印记。上古巫史不分，史官实际上是巫师中从事载录和文献保存的人员，因此，史官具有宗教背景，并随着文献的累积，渐渐由天命神意的见证者、阐释者，而拥有了意识形态话语权力，并且得到社会的认可。他们虽然在王朝居官，但多为兄终弟及，父子相传，依道而行，不唯君王马首是瞻。也就是说，史官的职业行为和文化精神都依赖一个遥远的巫史传统，而相对独立于治统之外。这一现象在战国以后虽然渐趋衰落，但却一直艰难地持续到司马迁时代。东汉时期，非史官世家出身的班固被汉明帝任命为史官，遂使这一传统宣告终止。

从文献上来说，史官制作的甲骨卜辞、钟鼎铭文等，其目的在于神圣见证，虽有史料价值，而非史著。自《尚书》以后，古人所谓“六经皆史”，也只有在皆出于史官之手这一点上才能说得实在。而这些文献也非真正的现代意义上的史著。如史学家所说：“春秋以前（甚至是战国以前）……虽然已经有了史官，但是当时的史官是为上层及祭祀占卜服务，其性质仍不同于后世的史职。‘史’的概念还在萌芽的阶段，真正为记录

---

<sup>①</sup> 史学界所谓“原史”指的是一个较早的历史时期：“既包含有一些距文明时代可能较为久远但却为周围进步族群或民族文献记载所涉猎的后进民族的史前历史，同时也包括一些缺乏直接文字资料而又临近文明时代、传统上多归于‘传说时代’的民族历史。”（钱耀鹏：《中国原史时代论纲》，《文博》2002年第2期）

历史的历史记录还没出现，这些都与西方对原史时代的定义相符。”<sup>①</sup> 其实，从《左传》、《国语》、《战国策》一直到《史记》，它们与“六经”一脉相承，也都不能算是“真正为记录历史的历史记录”。这又与班固为汉王朝立史的自觉意识大有不同。《尚书》、《春秋》、《左传》、《战国策》、《史记》等上古史传作品，在文体方面各有自己的特征，这些特征都有着自己的文化逻辑，只有将这些史传作品与其所赖以产生的文化背景结合起来考察，才能揭示这些文体的特征和功能。

原史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原史文献则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经典，对后世思想观念、话语模式、文本形态都有着深远的影响。本书以原史文化的发展轨迹为线索，着重探讨史官体制、职业精神与文献形态、叙述方式之间的关系，探讨史官话语权力在文献中的表现方式，以及原史精神与道统之间的文化渊源。尤其希望能在以下几个方面求得一些实质性进展：（1）理清这一时期巫史文化的发展脉络，描述巫史文化形态，尤其是史职从巫史文化中脱离的经过，以及史官的职业理想和社会活动，并以此确认史官的文化品质和载录姿态；（2）分析上古史传作品的文体特征和它的发展过程，及其叙事方法的依据和文化功能，总结出史传作品在当时的传承、接受情况，揭示史传文体与史官职能之间的关系；（3）对《春秋》、《左传》、《战国策》、《史记》等主要史传作品的形式作出有效的分析，努力揭示出不同叙述方式和各阶段史官话语权力的对应关系，希望有助于确认这些史传作品在中国文化和文章史上的地位；（4）在文化转型过程中，原史秉承天命、裁决天下的载道意识，是如何发展变化并最终影响了传统士大夫的道统观念的。

本书的基本脉络如下：

原始文化以巫术宗教为主，“绝地天通”的故事标志着巫覡从全民皆巫的混沌状态中独立出来，作为一个特权阶层，开启了巫政统治。为了维持这一阶层的地位，祭祀仪式更为繁杂，祭祀行为的延续性、系统性受到重视，于是文献载录和传承成为必要。从甲骨卜辞可以看出，殷商和西周时期的史官同时兼有巫职，所执掌的文献除了有名姓之后、昭穆之世、礼

---

① 吴晓筠：《中国的“原史时代”》，《华夏考古》2005年第1期。

节之宜外，还负责占卜祭祀过程的载录和保存，也拥有祷祝及昭示天命的权力。因此，史官在社会生活中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甲骨卜辞等文献的出现，一方面它是天人交往的见证方式，另一方面也是宗教仪式规范化、巫职专业化的结果。文献是有着历史存在感的神圣象征物，它在仪式之外，为巫政合法性和行为提供又一重重要的依据。随着文献的不断累积，史家在宗教和世俗社会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以致国家的“大小官名及职事之名，多由史出”<sup>①</sup>。殷商史官文献包括文字文献和图画文献。前者包括甲骨卜辞和一些宗教场合中的记言，后者主要是刻绘在铜鼎等器物上的各种物怪图像。它们都是对天命、神异现象的指示或见证，虽然还只是一些片段、孤立的载录，但已经形成一定的叙述程式。

周代史官及其职事基本上承自商代。周公摄政和制礼作乐，是一次将巫职和行政事务分开的尝试。七年后，周公归政成王，意味着这一尝试的失败。但这一尝试有着很重要的文化意义：它使得巫史的职能偏向于宗教和精神生活，并通过训、诰等形式规范、影响着世俗生活。可以说，周公的政教分离实践，是中国道统观念的源头和依据。周代史职的文献功能进一步加强，举凡仪式活动中的文字行为都由史职承担。史官所记录的诰、誓、命、诫等，为《尚书》的编纂奠定了基础。此外，出于占卜和制礼作乐的需要，巫史开始了采集、编纂、传诵诗歌等活动，从而又使得这些韵文成为重要的巫史文献。自西周开始的谣占、易占，到春秋时期的“赋诗言志”，显示了韵文文献的神秘功能。

春秋以降，史家在继续着自己的宗教工作之外，更进一步介入社会政治生活，在政治、军事、外交等领域，起着训诫、指导、辅助的作用。史官的载录行为中，也有了世俗社会的地位。春秋时期存在着两类载录制度：“告命”和“传闻”。前者指各诸侯史官独立记事，并来拥有周人宗庙的鲁国“告庙”，这是一种宗教行为，鲁国史官据此载录而形成的文献就是“典册”。“传闻”是鲁国史官对某事（通常是“告命”之事）的私下交流，是一种社会性行为，据此载录而形成的文献就是“简牍”。前者是《春秋》的原始形态，后者则是《左传》等书的原始形态。“典册”

① 王国维：《观堂集林》卷六《释史》，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影印本，第272页。

文献遵循着自甲骨卜辞以来的宗教载录传统，以一种谨严的方式记事，所关心的是事实本身是否合礼，遵从宗教禁忌思维，所以它不关心事实的过程，也不进行价值评判。但春秋史官们并不甘心如此，他们在遵循传统记事规则的条件下，通过有选择的呈告方式，昭示种种有意义的事件，并在此基础上借助年节时序、常事不书、隐讳等细微的变动，暗示着自己的褒贬态度，意在捍卫行将崩毁的礼乐制度，同时也构建了史官自己的话语权力。这就形成了“春秋书法”。《春秋》的基本叙事姿态是“呈现”，其叙事原则则是“记异”和“异记”，它们依赖宗教背景发挥作用。《左传》等“简牍”文献是史官追求对现实的阐释权力和裁判权力的体现。在社会理性迅速发展的春秋时代，宗教性载录的意义逐渐晦暗不明，一些有着改革意识和时代精神的史官，开始着意于道德理性。这表现在载录职事上，就是通过“传闻”的形式，关注事实发展的原因和结果，发表自己的评判，直接干预社会政治。这就形成了在史官内部私下传授的“简牍”文献。《左传》的叙事形态已由事实“呈现”转而为对事实过程的“再现”。史官认为，任何重大后果都有其可供追溯的细微原因，同样，任何细微的行为（通常是与礼仪有关）也必将导致重大的后果。因此，《左传》叙事的最突出特征就是关注因果关系，并在因果叙事中确立一种道德意志。同时，“简牍”叙事并没有放弃宗教思维，《左传》中有大量的灾异事件、神秘事件的载录，史官认为占卜、祭祀、梦验、礼仪等情节可以揭示人物或国家的命运。这一点反映了史官的宗教背景。此外，原史文化还赋予史官箴诫的权利，表现在文献上就是一些格言形式的“语”类文献，如《逸周书》中的《周祝》，以及春秋末期出现的《老子》等。总之，春秋时期的史传文献表现出较为复杂的思想倾向。一方面，为了强调自己文化创造的合法性和神圣性，它们依恋甚至神化自己的传统，张大天命意识；另一方面，为了建设新的社会理性，他们又不得不淡化甚至反对天命意识，强调伦理、民本等理想精神。后一思想的发展，必然会动摇史传载录的神圣地位，预示着史家的宗教文化功能由盛转衰。从《春秋》到《左传》、《国语》，既显示了史官文体的发展，又显示了史官文体的分工协作。

春秋晚期到战国时期，社会文化剧烈变革，传统上以礼崩乐坏来概括

此时的状况。此时，人们的宗教意识越来越淡薄，礼仪规范不再具有约束力，以礼仪为职的巫史人员自然也就为诸侯卿大夫们所冷落，有相当一部分史官们不得不从史职中脱离出来，转为普通官员或无职的士。而成为士的这部分史官，只能以文献授业谋生，促进了私学和学术的发展，为士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实际上，在史官文化和士文化之间，还存在着一个君子文化。君子文化形成于春秋时期，它的主体是贵族大夫。这一文化人群并不依靠政治身份划分。他们是这样一些人：理解并坚持礼仪精神，同时也能引领社会理性的发展，他们通过“观”、“问”等方式掌握了原史文献或礼仪知识，并能够立言于世。立言的形式规范是对原史文献或史事的征引。君子文化中所包含的精神义理，受到当时史官的揄扬，并被载录下来。到了春秋晚期，以孔子为代表的士人，继承了原史文化和君子文化，将原史文献当作自己的话语资源，进一步发扬亦已形成的理性观念。孔子对原史文化的传播和阐发有着巨大的贡献，他将作为原史职业性修养的“六艺”发展为社会伦理规范和人格精神境界，他通过编纂《春秋》而展示了以道义裁决天下的精神，他以师道传统代替了原史的职业传统，使得原史文化精神在脱离了宗教背景和职业背景后，不至于遽然中断。孔子作为一代文化的开创者，有着自觉的使命感和传教意识，而这一点也得到后学的认同。《论语》一书是孔子弟子仿照原史“语”类文献体例编纂而成的，在体例上表现为指示性特征。孟子根据礼仪文教的贡献而将文王、周公和孔子编入一个统系之中，称“五百年必有王者兴”，从而为道统说奠定了基础。

战国史职衰微，但前代史官文献有很大一部分是在此期辑纂成册的。值得注意的是《战国策》一书。此书是刘向据战国到西汉前期的多种文献编辑而成，其中既有史书，也有子书类资料杂编，还有用于揣摩练习的“脚本”。《战国策》虽然在形式上承继了前代记言体史书，但已是纯粹的记事作品。它着眼于现实和未来的谋划，关注事实的结果，表现出浓厚的功利主义倾向。就叙事而言，《战国策》既非《春秋》式的“呈现”，也非《左传》式的“再现”，而是表现虚拟性的“表现”。它以预设情境、夸张和对比、营造心理优势等方法，获取听者的认同。因此，《战国策》叙事不作用于听者的信仰和理性，而作用于听者的情绪和美感，其文学意

义更明显。在策士游说和诸子著作中，寓言被广泛地运用。策士寓言多为经验性故事，它提供一个亲切的姿态，提供一个值得借鉴并且包含着行动方案的实例，因而能得到听者的认同。寓言在叙事上表现为情境的营造、戏剧性以及片面绝对性等修辞性特征。战国士人取征于寓言，也就回避了信仰和真理，显示了对世俗社会的日常经验的关注。

秦朝一统天下取决于军事力量的强大，也可以说是功利主义的胜利。原史文化也就随着秦始皇的焚书坑儒而走进低谷。从汉初一直到汉武帝时期，儒家士人通过积极而艰难的努力，终于使得朝廷重新关注礼仪和文献，原史文化也就在儒家的政治理念中重新被激活。至迟在汉武帝时，朝廷又重新设置了史官。汉代经学是一场原史文献经典化、政治化的运动。公羊学家将《春秋》看作构建大一统意识形态最重要的出发点和理论根据。在“微言大义”的理论原则下，董仲舒从天人关系理论到现实按狱断案，在各个层面上对《春秋》的意义作了最大限度的阐释，在实践中再现，甚至夸大了原史的政治文化功能。但是，春秋公羊学作为一种政治哲学，它在巫史传统和帝王集权之间首鼠两端，虽然强调原史经典的话语权威，但却将史官所拥有的宗教神权让渡给皇帝，严格限制了史家或儒家的对灾异等神秘现象的解释权力，因而也就剥夺了史官来自天命的话语权力。原史传统由此而全面衰落。

司马迁撰写《史记》，是原史传统的回光返照。司马迁自父亲那里接受了史职，同时也接受了公羊家对孔子撰史精神的阐发，期望能再现孔子的“素王”大业。但“文史星历”文化权威的失落，司马迁自身的悲惨遭遇，显示了原史文化和大一统政治之间冲突之激烈，展示了在现实与司马迁的理想之间有一道不可跨越的鸿沟。在无比的悲愤之中，司马迁凭借着神圣的职业传统，超越了帝王的权威，把撰史的意愿转变为一场轰轰烈烈的文化复仇行动。《史记》在最大范围内展开了对当时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系统的批判，这是对原史传统和自身品质的双重捍卫。而如此冒犯皇家威严的《史记》能在汉武帝时期顺利撰成，则是皇权对这一悠久的原史传统的最后的妥协。司马迁对现实理性的失望，导致了他对个体命运的关注，这使得《史记》散发出浓烈的悲剧气氛，也使得《史记》的文学性大大增强。《史记》五体结文的形式，既是对前代史官文献的继承，又有

着自己独到的创造。五体的形式反映了天人合一的观念，但却是以人为中心，重在叙述个体的成长和命运。这是史著转变为传记的关键性因素。此外，“太史公曰”和“互见法”，也是《史记》最为突出的叙述特征。前者承自“君子曰”而来，反映了司马迁对史官文化权威的依恋，来自原始传统的观念，有时会和自己的个性精神相互抵牾，留下不少矛盾的表述。后者来自传统史官的“隐讳”笔法，反映了司马迁在将史著由记事转而为述人过程中的限制和突破，也是司马迁“好奇”的撰述观的体现。在《史记》撰写过程中，司马迁所提出的“发愤著述”观点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它认为，著文批判的权利，不仅来自宗教和天命，也同样可以来自撰写者的个体意志，这就为后世文人继承和发扬原史的批判精神提供了理论依据。

《史记》以后，中国史官文化经历了一个裂变的过程，《汉书》是这一裂变的标志。班固出自史官传统之外，是皇帝的命官，所修史书只能表现朝廷的思想意识。自此，中国史著撰述就完全附属于以帝王治权为中心的政治理性，成了当世统治集团自我证明或资政的材料，早期史录所具有的文化创造或文化批判精神基本丧失。但中国原史的使命意识、创造精神、人生关怀等，通过“道统”和“发愤著述”这两个媒介，仍然在历史上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后世一些杰出的文人，如扬雄、韩愈、朱熹、康有为等，皆以道统继承者自居，或以超然无畏的姿态批判朝政，或以极大的热情投身于理论建设，成为中国文化史上的精神巨人。而中国古人对撰史的热情和对史传作品的敬重，以及文人所经常采用的以史讽今的政治批评方式也是中国原史精神的延续。

## 第一章

# 史职及其文献的产生

历史既是现实得以存在的依据，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人类未来的发展方向。中国人很早就已经形成了十分清晰的历史意识。商朝时，巫祭行为的专业化，巫祭知识的繁杂化，使得巫史成为一个有着高度同一性而分工明确的职业联盟。史职的产生，是巫祭文化自身发展的必然结果，它维护并进一步巩固了这个职业传统，使得职事行为更加专业化，也保证了天人关系得到更加清晰的呈现。史的最基本职责是对宗教行为进行载录和相关文献保存。我们现在所知的最早文献包括文字、图画、符号、口传等多种形态，它们的主要功能是见证天命鬼神的意志，延续祭祀占卜的职业技术等，因此，巫史文献有神圣性。在载录和保存过程中，史职逐渐获得了对天命的解释权，并最终成为天命的代言人，成为意识形态权威，并作为专业人员指导着社会组织和管理。

### 一 “绝地天通”与史职的产生

#### 1

早期文化形态混沌淳朴，随着社会文化的发展，必然会经历一个分化的过程。《庄子·天下》云：

天下大乱，贤圣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犹百家众技也，皆有所长，时有所



用。虽然，不该不遍，一曲之士也。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察古今之全，寡能备于天地之美，称神明之容。是故内圣外王之道，闾而不明，郁而不发，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后世之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道术将为天下裂。

《庄子》谓古人所直观体验的浑然一体的“道”，在后代被各执一端的“百家众技”所分解，每一学派自陷于狭小的范围之中，所以只能得道之一隅，离古之“道”相去越来越远。所谓“纯”、“大体”者，皆指远古文化混沌一体的性质，而后世分门别类之学就是从这混沌一体中分化而出。史学自然也不能例外。要追寻史学的最初形态，就只能返回到远古的混沌一体的文化之中去。

青铜器是中国早期文明的主要表征物。青铜器在上古时期主要是用作祭器、礼器，“在巫教环境之内，中国古代青铜器是获取和维持政治权力的主要工具”<sup>①</sup>。从龙山文化出土了大量青铜器、陶器、玉器，它们在形式上都有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外形精美、不耐实用、制作费时，而且为少数人所占有<sup>②</sup>。这些都说明青铜器大多数是用于祭祀，并且存在一个宗教特权阶层。这一专业的核心就是巫觋集团。从现有文献中，我们知道商朝文化中最核心的观念是人和神的关系。《礼记·表记》所谓“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说的就是人神关系在商代绝对优先于人际关系，人神关系构成了商代社会的基本秩序，而巫在这之间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甲骨卜辞中巫字形作，李孝定以其得之于“巫者所用道具之形”<sup>③</sup>；张光直以为即木匠画方圆的矩，并引《周髀算经》“方属地、圆属天、天圆地方。……是故知地者智、知天者圣。智出于句、句出于矩”，以说明“矩便是掌握天地的象征工具。矩可以用来画方，也可以用

① 张光直：《从商周青铜器谈文明与国家的起源》，收入《中国青铜时代》，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480页。

② 参见高炜《龙山时代的礼制》，收入《庆祝苏秉琦考古55年论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年版。

③ 李孝定：《甲骨文字集释》，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70年，第1598页。